

87 第2期

(总期014)

阳江文史

政协广东省阳江县委员会编

1987年6月

PDG

〔教育史〕

- 阳江县教育概况(续完)……………曾传荣(1)
阳江县农业职业学校简史……………黄云程(7)

〔回忆录〕

- 解放前夕阳江金融市场一些情况……………谢彦伦(9)
解放初,抢修阳江公路(现广湛线公路
阳江段)支援解放战争片断……………萧毓秀(11)

〔人物·人物传〕

- 孝则先生行述……………梁方度遗著(14)
广泰成漆器店老板郑文光……………谢彦伦(20)

〔文物志·信息〕

- 最近发现的两座东晋古墓……………文物办(23)

〔农谚〕

- 阳江农谚……………高阳云搜集(25)

〔方言〕

- 阳江方言探源(九)……………许培栋(31)
阳江历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县志办(41)

〔小资料〕

- 阳江历史上特异风灾……………曾林(40)
清末阳江的蚕桑事业……………高阳云(22)
《阳江诗钞》的作者……………曾华(24)
-

阳江县教育概况（续完）

曾传荣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中小学的工作和领导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而蒋介石却违反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团结建国的愿望，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十月中旬，我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在恩平朗底整编，国民党调动广东反动军队一五六师和五县反动团队三千余人于二十二日突然包围朗底我军，我军突围撤退。为争取和平，实施“双十协定”，我粤中区遵照中央指示采取分散隐蔽措施。中共阳江县城镇宣传委员何明，一九四五年原在景光小学以教员身分为掩护，领导县城学运；一九四六年二月，与从部队疏散回来的周文奏转到四区桐山小学任教，继续领导县城学运。次年二月，左大年（平）（四六年二月至四七年一月在南恩小学）也由县城转到桐山小学。数月后，文奏被捕，何明、左平于七月转回县城。

一九四六年初，李碧（如碧）夫妇在儒洞小学，罗秩秋（罗杰）在寿场小学任教。四月，黄其光（原名黄乔生）接任寿场小学教职，秩秋撤离。同时，陈厚祥仍坚持在儒洞附近几间小学从事地下工作；陈牧汀（念衡）、邝伟莹夫妇分别在沙扒、寿场小学，范林在双渔小学，与隐蔽于其他单位的党员紧密联系。

一九四五年夏，林良荣调任阳江东区联络员，负责二三区工作。秋，曾传荣从阳春调入大沟沙冈小学，车振伦、岑业楷、谭葆英在北惯端本小学。次年，岑业楷调合山小学。秋，陈家治入二区

良洞小学，范兴文、卓朝光由介龄小学转入卢山小学。四七年秋，陈家治转入卢山小学，卓朝光撤离。许国尧由县城工人子弟学校转入北贯利屋寨小学。陈修谦在笏朝小学。党员们分布在乡间小学，借以加强农村党的组织，以俟时机。

阳江县中学生支部书记何振超毕业离校后，由谭友衡任支书，谭毕业后由施美馨任支书。在镇委的领导下，重视新生力量的培训，一届毕业，又有在校的三年级的学生党员任支书，因而县中支部经常有一批骨干党员在坚持工作。一九四八年后，支书是兰志雄，女生支部书记是谭丽冰。

一九四七年春，县城开办私立文范中学，通过统战关系，许荣坤、陈尊入文范当教师，陈国维任总务，次年兰志雄也进入文范中学（仍是县中支书），一九四九年秋关立矜也入文范任教。从此，文范中学成为我党的重要据点。一九四九年春，廖正纪入县中，施宝祯入宏中中学任教。

一九四七年春，粤中地区各县地下党和人民武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战略部署，开始恢复武装斗争，执行“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地下党组织，加紧继续深入社会调查，了解各区乡村的各种力量和动态，积极加强统战，配合形势的发展，支援武装斗争，伺机行动。凉秋九月，林良荣与在台南活动的陈中福（华森）取得联系，商定互相配合的方案，建立据点，动员参军。二区表竹村是重点之一，黄德昭回表竹小学，即加紧活动，曾传荣调三东乡中心小学（良洞村）。在阳东区委的领导下，一九四八年秋先后在良洞、表竹小学发展了三位党员；黄学璇、陈国佐在表竹小学，李云由良洞转入北政小学建立附点。同时，雷启光由香港回来，任扶东中学教导主任作掩护，与林良荣直接联系，从事统战工作和经济工作，以支援武装斗争；并在学校建立交通站，使扶东中学面貌一新，培养了一批进步师生。

两阳中学自从阳春迁回原校上课后，党员都陆续毕业离校，后又因停止发展组织，学校已多年没有党组织活动了。直至一九四七年

夏才先后发展了冯正廉、赵桐入党。而这时国民党对学校和学生更加紧控制，诸多束缚。在扶东中学地下党的引导下，大沟区属的一批进步学生雷志中等以总务侵吞伙食费为导火线，掀起了学潮。两中和县城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县中党支部发动学生乘势支持。这次学潮震动很大，打击了反动派压制学生的气焰，一批学生参加了游击队。

一九四七年秋，六区反动势力为争夺把持奋兴中学，以防剿区主任黄懋昭为首的一方，与校长谢彦谈为首的另一方开展拼命的斗争，严重影响学生学业。学校学生党小组里的徐开森、江宗栋（玉岳）等向当地游击队反映，部队派武工组长李世谋联系布置，成立学潮领导小组，叶大生、翁飞等一批学生加入小组。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和印发传单，反对双方为争权夺利而破坏学校，不能开学，荒废学生学业的罪恶行为，揭露和指责国民党教育腐败。反动的双方僵持，互相攻击，使学潮有理有利地进行，深得社会舆论和家长的同情，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若思中学环境特殊，难于开展工作，一九四七年秋至四八年夏，廖正纪却在该校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九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推动下，革命进入了高潮。阳江县城区的学运紧密配合全国大好形势和地方武装活动。春，区委书记何明决定建立附城党支部，这时曾传荣在岗背西小学，周炽奎在报平小学，黄徽拔在埠场小学。埠场小学是个老据点，一九四〇年便有曾传荣等在此任教进行活动，黄徽拔从一九四四年起一直在此校活动。这里是县城区与罗琴区的一个联结点。报平小学，我党亦早已在此从事工作。日本投降后，许荣坤（从介龄小学撤来）、谭昌等在校中为县城区刻印党的学习文件和传单，这时是县城与阳东大沟和丹载党组织的交通站。在抗日初期，中共阳江特派陈奇略带“青年群社”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岗背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

展了党组织，组成了“岗背村农民抗日自卫协会”。此后一直为党的一个重要据点，群众基础深厚。（岗背村关盛三叔的家在抗日后期已成了堡垒户，两阳特派员周天行和县委领导司徒单常住其家，黄光在其家治病，病歿由其埋葬。）附城支部范围广阔，支部统一行动，互相配合，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个有几十名成员的“解放军之友社”。和县城一起，在区委布置下广泛配合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发放传单、布告的宣传攻势。岗背小学与两中接近，密切与两中联系，抓紧对积极分子的培训工作，于七月间发展了李焕华等四位高三学生入党，成立了支部，后又发展了团员。根据区委规划，李焕华竞选了学生会主席，准备带领成批学生参队，学生梁荣芳已准备了手枪，后因忙于迎接解放工作而未实现。

县中党支部入春以来更活跃了。早在一九四八年夏，阳江县城区委乘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布置县中党员黄德基、陈香兰（向兰）、李子云等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发动组织“流萤学术研究社”，吸收了二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创办《流萤》期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进步作品，引导青年重视课外阅读，关心国家前途，从黑暗中探索光明。校长谢彦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发现第二期文章讽刺国民党，害怕这点小萤光照出黑暗的国民党的点滴丑恶原形，竟于八月下令取缔，搜出剩余的《流萤》烧了。由于反动派伸出触角，疑云密布，区委便作出决定，将黄德基撤回阳东工作，陈香兰也转到新洲小学任教；并改变斗争策略，党员社员退回各班，深入串联，组织读书会，学习理论和形势，加强团结，推动进步青年学生走向革命。

一九四九年“五·四”前夕，区委以阳江学联名义秘密而广泛地散发《告师长书》和《告同学书》，讲明形势，号召师生反对国民党的恐怖迫害和饥饿政策，积极参加战斗，参加学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青团），迎接解放。这次政治攻势，在师生中和社会上影响很深广，使国民党反动派震惊。学校党组织进一步发展了。

县城各小学的党员，在区委的领导下，从多方面配合开展工作，

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阵地。陈佩瑜在抗日中期已在南恩小学，直至阳江解放。解放战争初期，左平亦在南恩小学，一九四七年左平迁出，谭启浩于简师毕业后转入南恩小学，次年秋再转入师范附小。陈尊早在一九四五年便在下濠小学任教（当时名城西乡第六保国民学校），一九四八年秋复来任校长，许建莲、左平、林乐为教员。许国尧在廉溪小学负责县城区油印工作。一九四四年，何瑞、施宝祯在短期小学。（设在旧豆腐巷口，原八至十二保国民学校）一九四九年秋，彭德礼、莫蔚萃参党，使精武、短期小学加强了党的力量。

在广州读大学的一批青年和县城的进步教师，暑假期间，在区委的统战工作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从事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其中林进名、关立衿、周炽珩这时参加了党。

江城区委在这一年间，发动了好几次强大的政治攻势，大量印发阳江县民主政府布告、广阳支队、八团战讯、我党我军政策、命令，并对敌反动军政人员发警告信件。县中、两中支部，教师支部、附城支部所属党团员、解放军之友社和工人支部、妇女支部等统一行动，每于一夜间，全城街头巷尾、附城据村、邓铺、玉沙、埠场以及反动政府机关及其骨干的住所，都普遍散发了传单、布告。群众欢跃，敌人震骇。

一九四八年秋，全县开始发动青年（包括青年师生）参队。四九年夏，县中、简师、文范等中学生便由党组织发动分批参队，其中陈贤、陈希礼一批男女学生达十八人。为了加强对入队青年学生的培训工作，县城区委谭启浩和卓朝光、冯正廉等几批党员教师、学生参队。各区私立中学，如奋中、漠南等中学学生也陆续参队。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在恩阳台主力会同阳东主力夜袭驻大沟的阳江县警大队敖敏超获胜后，雷启光布署引导扶东中学二十六位学生，由学校交通站负责人茹立言、雷家义带领入队，学生李洪基、余和卓等四人还从家里带了手枪入队。

县城中学在区委领导下，几个月来加紧了学习和工作，经过不

断的斗争锻炼考验,除了发展党的组织外,还加强了建团工作。由党员徐学璇、李子云、陈开臻、许钦华、何向群等 党 员 培 养 介 绍 县 中 何 劲、林恩葆等,两中李焕华介绍王奇明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新青团。们他密罗紧鼓地和工人、妇女分头开展迎接解放和支援前线的组织准备工作。十月初,开展护校活动,组织学生救护队、支前队,积极为解放阳江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敌人在县城所设置的堡垒,深入侦察绘制地图,急送部队,准备巷战。十月二十四日晚,阳江县城解放。次日晨,学生救护队、输血队,在区委和各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为四个临时伤兵医院服务,护理伤员和输血给伤员。还立即组织了一支廿余人的队伍,由陈香兰带领到埠场、平岗前线服务。青年师生和工人妇女互相配合,各方面工作都 整 整 有 条,做得很好,胜利完成支前接管工作,受到野战军的表扬。



阳江县农业职业学校简史

阳江县农业职业学校，简称阳江农校，又称阳江农职，是为了培育高初级农业技术人材，以发展本县农业建设而建立的。在1947年初开始筹建，1947年秋季开始招生。校址设在阳江城南门外牛墟先农庙，内设办公室及部分教室和宿舍，后扩建教室四座；解放后，接收同济善堂（现在的岗列医院）及育婴堂等处，范围比较扩大了。后来拨有农场土地若干，作为学生农事实习之所。解放前该校比较简陋，但解放后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帮助，设备中的图书仪器比较充实，已经具有一间农校的规模了。这间学校的行政统属，在解放前，属国民党阳江县府，并由县政府的教育科直接领导；解放后则由阳江人民政府教育科直接领导，再上一级则属广东省教育厅，技术领导则属广东省农业厅。该校经费均由政府供给，是一间公费学校。在解放前，每个学生每月供稻谷三斗，以充伙食，解放后，则享受人民助学金，由学生评定发给。该校开办至结束历时八年，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建校之初，校长谭树，教导主任姚德光，总务主任卓宏康，农场主任谭德峻。教师有郑家珠、张焰中、谭保民、黄云程、谭聘时、谭显驹、林敏芬等。1947年秋开始招生一班，学生四十人。基础课、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动植物等（解放后加授政治）农业专业课则有农业概论，作物栽培学，畜牧学，土壤学，森林学，昆虫学，植病学，育种学和测量学等，并配备农场实习，理论结合实践。学制定为三年。又招农事训练班一班学生30人，学制一年，集中作短期的农业技术训练。学科则着重作物栽培、畜牧、园艺、农业经济、农场管理、植物病虫、育种等门类。该班只办了一期，学生毕业后亦多在当时的农业机关服务，亦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初

农场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招生一班，至1949年10月阳江解放，已有学生160人多了。

解放后，阳江农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重视和发展，1950年1月至1950年8月间由林良荣同志兼任校长，林进名同志任副校长、黄云程任教导主任，苏雅培任总务主任，谭德峻任农场主任（兼指导学生实习），教师则有周织珩、叶秀森、卢显曜、周织钊、李家献、谭定汉、敖浩昌、陈金锡、梁修驹、侯吉明、冯英材等。1950年秋第一班学生已届毕业，即行分配工作，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招收一班。1950年8月林良荣、林进名校长调职，委冯英材同志继任该校副校长，时间半年，1952年秋刘贻恩同志来任校长。那时由于党对该校的重视，把原同济善堂及育婴堂两处拨给该校，辟为教室膳堂和宿舍等。这样学校范围扩大了许多，同时增购图书仪器，又在校内增设变压器，扩大照明，各部分设备比较完善。至1954年春恩平、电白、阳春、化县等四间农校奉令结束，拨来在学的学生，规模扩大，学生更多。又由于以上农校已办有高农班（中专级），对所拨来的高农班学生，要照高农课程讲授，这样阳江农校便由初级农校而晋升为高级农校了。至1955秋该校奉令办理结束，高农学生则分别转入高州农校和仲恺农校继续学习，至初农毕业学生，除一部份分配工作外，其余有些学生考上高州农校、仲恺农校或其它学校继续学习。

阳江农校自1947年至1955年办理前后八年，由于该校有助学金的补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多是艰苦和勤奋的，这班学生经过艰苦的锻炼，意志坚强，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对党亦非常热爱。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都是党的教育和自我努力所得的结果。

黄云程

解放前夕阳江金融市场一些情况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带来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起，弄至民不聊生。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湿柴”比喻贬值的通货是怎样的含义。

1946年上半年法币和美元的汇率大体上稳定在2,020元比1元。下半年已变为3,350元比1元。到1947初美元汇率已提高到12,000元比1元。下半年又提到39,000元比1元。此时市面已是把法币作为“湿柴”看待，物价一日数涨，正当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以1946年1月和12月的谷价相比，1月的每担谷为9,000元，12月涨至29,000元，涨价三倍多。隔两年后到1947年底谷价每担590,000元，涨价65倍，而到1948年80,000,000元，涨价九千倍。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恶性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人们还记得，1948年上半年的“湿柴”一万元至4万元，群众已拒绝行使，广东省银行在1948年8月7日不得不通电，1万至4万元券要人们照常行使，然而深受金融物价波动之苦的劳动群众，对此一纸空文，根本不相信当局的胡说八道，故物价风潮只有越括越猛。

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补充内战经费，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规定，宣布发行金圆券，以三百万元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金圆券四元比值美元一元。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国民党政府变换什么花招，其通货膨胀是注定要扩大下去的，请看发行金圆券之初，稻谷每担

55元，到了年底涨至315元，到了1949年4月稻谷每担748,000元，时隔八个月谷价竟然涨了一万四千倍。谷价如此，其他物价的指数也是以谷价为依据的上涨。

在法币兑换金圆券的风潮中，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老妇某，她隔邻就是同丰米机，她在米机前的场地上扫糠屑，拾谷粒，养下十多只母鸡来生蛋。几年来省吃俭用，积蓄了不少法币，用皮箱收藏起来，留作身后的丧葬费用。到金圆券兑换法币时，她几年收储的法币，只可买几只鸡蛋的等价。这个老妇经几年辛劳积得的血汗钱，一旦化为乌有，爱财心切，竟致昏迷，后经邻居抢救，才救回一命。

由于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不少投机份子进行囤积居奇，以此相适应的做月会风气盛行。会首邀集亲友的12份为一会，每月一期，一年结束。会首照定额十足先领，拿出一份会金作为请会酒用。以后每月开票投领，以票额最低者得，以后按月十足充会，其差额作为利息。领取的人仍拿一份会金做会酒。

抗战胜利后，做会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可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会首和先领者发了财，后领会者吃了大亏。1947年以后主要以黄金每钱为计算单位，也以黄金折合港币为结算。同时运往香港、澳门、广州、江门等地的农村产品和水产品，带回的钱，大多数是黄金港币。一批见有利可图的商人，便乘时开起了金铺，计当时在县城开设的金铺有十二间之多。这十二间金铺资金虽有多有少，但在通货贬值，黄金市价直线上升的时机，却也生意兴隆，其门如市，大部分金铺都发了横财。而这些投机倒把的商人的兴风作浪也更促使国民党的经济更迅速走向崩溃。

（谢彦伦供稿）

解放初，抢修阳江公路(现广 湛线公路阳江段)支援 解放战争的片断

萧毓秀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沿着水陆两路向海南方向狼狈溃逃。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军紧紧追击，它们妄图阻碍解放军的进军，十月二十三日在撤退入阳江境后，即把入境不远的那龙桥（长52.6米木桥）放火烧毁，撤至离阳江城约十公里时，又把那霍桥、金村（1）桥、金村（2）桥加以严重破坏。然而，它们垂死的挣扎仍然挽救不了反动派的灭亡命运。二十三日夜，我左右两路军分别到达阳江双捷、合山，二十四日晨，右路军分别在白沙以西的木金水和瓦窑头以南截断敌人西逃之路，分头向白沙、程村进军，下午四时许，左路军的中路军在阳江县城西北部与敌激战，六时起，中路军解放阳江城，左路军向南排、鲛鱼头追歼敌人。傍晚，敌人放火烧毁鲛鱼头渡口公路浮桥。使国民党刘安琪兵团残军四万余人被围困于阳江白沙地区。十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发起进攻，经过几番激战，刘安琪部被迫向平冈海边溃逃，除刘安琪及其随从数百人乘船逃窜海南外，二十六日中午，其余全部被围歼于平冈沿海滩涂。

二十五日，阳江县成立军管会，下设交通处，处长由县长姚立尹同志兼任，廖绍琰任副处长，并开展了支前工作。立即决定成立公路抢修工程处，并任命罗承烈工程师为工程处主任，负责完成抢修

工作。工程处开会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完成任务的办法。罗工是本地人。有一定的威望，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材料困难，人力、运输力量不足等客观的不利因素。他充分利用人事熟悉的有利条件，马上分头组织人力。在通宵的研究会上，罗工提出要立定一切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的决心，学习解放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和连续作战的精神，以激励全体抢修干部、工人。在抢修的办法上决定：1、分工负责，分段包干，限期完成。2、抓住重点，突出急先。一是马上组织人力，把收藏的三艘渡车船修好，限期十月二十八日前必须送至鱿鱼头、湾头、下店等三个渡口；二是集中主要力量抢修被破坏最严重的那龙桥、那霍桥和金村（1）、（2）桥；三是请军管会派员组织民船，以便在鱿鱼头渡口附近另架一浮桥，供解放军人马通行。（3）沿线木桥，边检查边维修；所需少量材料，就地组织解决。对较大型木桥（如车田河桥）一时无法解决大批木材，则利用冬季水浅，沿着河床修筑便道作临时通车用。（4）对于小沟渠，尽可能利用有利地形土壤，另辟便道通行，暂可不通水的，先覆土通行，或垒起石块透水跨路堤而过，必需通水的沟渠搭跳板通过。（5）沿线软土基路段，组织群众挖通排水沟，路基上采用粗砂、砾石填筑一层路面，确保通车。在抢修的具体措施上，决定：1、请军管会立即查封阳江城及沿线墟市库存木材，铁料。凡适合用材、由军管会价购，其余启封自由出售。2、立即组织铁件加工码钉、直钉、罗栓等木桥结接部件。3、以基本人员为骨干立即成立几个抢修队伍。分路段限期完成抢修任务。4、组织工商汽车，确保材料运输。5、与军管会联系以武装保卫施工现场及押运材料运输，防止敌特干扰破坏。抢修队伍很快组织起来了，大家在思想上、措施上明确后，就分头出发。随后军管会宣布阳江县支前司令部成立，公路运输有罗承烈、罗嘉隆两位同志参加了工作委员会，并任命罗嘉隆为阳江车站站长，专责组织汽车运送军需和抢修公路材料。

当平冈的歼击战还正在进行时，罗工亲自在鱿鱼头工地指挥搭

浮桥。民船按时集中了，附近的群众都拿出了木条、床板来支援。有的群众还帮助绑扎。由于组织计划较周全，加上人多、干劲又大，只突击了四个钟头，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浮桥就搞成了，保证了解放军后援人马及时赶往前线。

在抢修过程中，天上敌机不断侦察、扫射，公路沿线也有一些溃败的散兵游勇和土匪的袭击、骚扰，不少汽车被子弹打得百孔千疮。十月三十日，一辆运木材汽车就遭到敌机的机枪扫射，司机李鸿谋同志和助手许纳同志幸免于难，但座旁的解放军同志却不幸中弹牺牲。又一辆运料汽车利用回空阳江时满载了解放军战士，也遭到敌机疯狂扫射，致十数人伤亡。又同在那一天里，正在赶修的儒洞大桥也遭敌机轰炸，一弹落河中，一弹落在桥头不远处，附近的民房给炸毁了。敌机在我保卫战士的对空射击中惶惶逃窜，保住了大桥的安全。工程处参加抢修的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十个昼夜。十月三日，最艰巨的抢修那龙桥比原定计划时间提前通车了。至此，阳江境内120多公里的广湛公路就全线修通了。电白、吴川两县在两县的中共县委的大力领导和支持下，参照这些办法措施，也很快地修通了境内的公路，为支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一月七日，阳江各界举行了有二万多人参加的解放胜利会师庆祝大会。野战军首长对阳江党政和群众的大力支援，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高度的评价。四兵团后勤部给阳江军管会送了一面写着“有求必应，无微不至”的锦旗留念，以对支援前线抢修公路等方面表示嘉奖。在大会上，阳江军管会还表扬了罗承烈工程师和罗嘉隆、李鸿谋等几位同志。

孝则先生行述

梁紹渠（方度）遺著

先父姓梁，讳庭楷，字国长，号直生，又号孝则。系达卿先生的长子，世居阳江县城。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十一月二十日寅时，生于阳江城内祖宅。

先祖父达卿先生，少时原系很贫苦的，后来经商，渐次发展，才积有稍富的资产。先祖父虽然是一个商人，却很注重读书，所以先父自幼就受到教育。但当时所谓教育，不过只教些八股试帖，先父却大大不以为然，说：“这些都是浮文滥墨，那里算得是学问呢？”然而在那个时代，自然免不得要做些举业的工夫，但先父却不肯专力于帖括，对于浮夸浓艳的诗歌词赋，也一样的不合脾胃，只喜欢经、史、诸子，以及当时所谓经济之学的一类书藉；而且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亦所欣赏。

先父既不好帖括，对于功名，自然是不大看得要紧的。然而先祖父由清寒起家，小人的嫉忌，贪吏的藉端侵袭……遂不能免，倘没有一点功名，就站脚不住。然而先父一直到二十多岁，还巴结不上一名秀才，先祖父又期望心切，所以先父就决然舍弃举业，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捐了户部郎中的官职，于是年到部当差，签分户部湖广清吏司行走；后来又请了二品的封典，封赠了三代。

先父在京的时候，曾结识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归善——邓铁香先生，一个是鹤山易兰池先生。邓先生的直声，易先生的硕望，都是大众共见共闻的。先父和他们订了金石之交，到死不变。只就这交友一端而论，也可想见先父的为人了。

先父在京候补了六年，因为先祖父母俩年纪老了，就告假归养。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先祖父达卿先生歿，享寿七十五岁。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先父服阙，回京销假，是年八月，即复告假措资回籍，从此，先父便不再走宦途，只尽力于本邑的公益事业。

本邑的米食，是很不够用的，从前交通又极不便，没有外来的米接济，所以一遇荒年，就有无数饥民，得不到饭吃，便结队联群的随处索食，名叫“分饥荒”。强悍之徒且乘机抢劫，往往闹出大乱来，那时地方上却没有一点办法，先父担心得很，就和姜芝眉先生等，商议救济的法子。后来议决，创设一个救荒的机关，名叫“书年社”。

本社的经费，系由公众出钱做基本金，以后就将基金的利息，逐年还给出钱的人，这个办法，好多人都赞成了，便公举先父和姜先生做总理。本社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8）正式成立。后来逐年发达，一直到现在，成绩的优美，为本邑公共事业之冠，本邑闹饥荒的事，也就完全消灭了。这是先父对于本邑的一个大贡献，也是先父生平最成功的一件大事业。虽然这事不是先父个人做得出来的，先父却是开山的人物，而且管理了三十年，比自己的事，还劳心得多，出力得多，到死之日，还是纪念着，所以本社才有这般成绩。这不是我阿私之言，大概知道的人都信得过吧。

本邑原有育婴堂一所，日久废弛，却没有人去理会。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先父承先祖母的命，捐银一千两，帮助该堂的经费。当时本邑的长官，厅同知杨左槐先生，就委先父做该堂总理，堂务遂稍为整顿。杨同知又奖给“孝义可风”的扁额，并转详广东巡抚，替先祖母清旨建“乐善好施”字样的牌坊。清帝也循例批推了。先祖母却是个最不喜欢虚荣的人，以为这点小事，也值得这么“铺张扬厉”起来吗？遂决意不肯建坊，先父只得罢了。

杨同知是个头脑稍为清楚的官吏，颇关心于地方公事。清光绪